

阳光照耀大地

茅茅起义前怯尼亚的生活片断

莫加·吉卡鲁著



阳光照耀大地

世界站立的森林、草原、沙漠、海洋、冰川

黄国光 著 北京出版



阳 光 照 耀 大 地

茅茅起义前肯尼亚的生活片断

莫加·吉卡鲁著

北京編譯社譯

世 界 知 識 出 版 社

1959 年·北京

Muga Gicaru

LAND OF SUNSHINE

Scenes of Life in Kenya before Mau Mau

Lawrence & Wishart Ltd.

London, 1958

根据英国劳倫斯—韦沙特书店 1958 年英文版譯出

阳 光 照 耀 大 地

茅茅起义前肯尼亚的生活片断

〔怯〕莫加·吉卡魯 著

北京編譯社譯

出 版 者 世界知識出版社
 (北京千面胡同 27 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 101 号

印 刷 者 北京新华印刷厂
发 行 者 新 華 书 店
定 价 每 本 五 角

开本 787 × 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张 5 $\frac{3}{4}$ · 字数 122,000

1959 年 10 月第 1 版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統一书号 3003 · 463

“……几年以前，如果一个歐洲人遭到暗殺，英國人就會將上百個吉庫猶人處以絞刑或者執行槍決來了結這個亂子。現在有人建議：應當有一個強硬的對愚弄原始野蠻民族沒有惻隱之心的軍事總督來負責處理怯尼亞的局勢，而且應當執行移民們所要求的戒嚴法……”

“怯尼亞每周新聞”記者

1952年2月

暗無天日的過去教給了我們信心，大家來唱信心之歌吧；

現代帶給了我們希望，大家來唱希望之歌吧。

引自黑人頌歌

前 言

一个被放逐的人能讀到他梦寐以求的国度的情况，原是一樁危险的事。这会使他回想起随着岁月的消逝而冲淡了的当初在狂热的欢乐或者辛酸的苦痛中所度过的光景；这会使他内心里产生一种怀乡的幽情。当那个国家又是非洲，而归途似乎已經遭到阻隔的时候，这就成为一种沉痛、难堪的感受。因为我认为，只有非洲才能使人长期患上怀乡病，才能使他直到临终的日子都会深信他永不是别地方的人。那辽阔的天空，起伏不平、黄橙橙的草原，灰尘飞扬的土道的景色和气息，山丘的寂寥和雄伟……怎能由英国恬静安逸的乡野来代替呢？何况，对于被非洲所热爱的人们来说，非洲和非洲人民是一而二的。我不是抽象地说。我不是以感情用事、糊里糊涂的态度，故意把非洲民族描绘成非凡的美妙。我指的是那些我一直了解和热爱着的非洲人，我现在仍然了解和热爱他们。当我在特兰斯凯^①的兹采河边垂钓的时候，阿倍尔站在我身边——身后陪着穹窿似的碧空和绿葱葱的羣山，显得那样优美。还有那样肃穆地跪在空寂的教堂中数着念珠的老瑪格丽特；还有伊兹克尔，还有希犹，还有奥比德，还有上百个别的人，我时刻想念着他们，他们也永远是我的现实生活的一部分。

① 特兰斯凯 (Transkei)；南非联邦的一个非洲居民保留地。——译者

但是，一本描写这种情况的书，当然必须表达出非洲真实的呼声。在许多描写那个令人迷恋、可望而不可及的国度的著作里，难得听到非洲人的呼声。难得尽管难得，却又是极其重要。

对欧洲人、殖民者、传教士或生意人来说，最大的危险和幻想就是他确信无疑地自以为了解非洲。就是这一点往往使他对那些“门外汉”竟敢批评他处理问题的意见，感到极端愤恨。譬如说，正是这一点使得南非联邦政府退出了联合国的会场。“我们了解土人，你们都不了解”。事实上，总的说来，住在非洲的欧洲人当然对非洲人茫然无知，因为他“了解”非洲人仅仅是凭着主仆这么一种关系。恰恰就是这种愚昧无知，不把非洲人当作一个人的那种盲目的、顽固的无知，结果终于造成令人触目惊心的种族问题的紧张局势，而这种局势又引起今日南非洲的悲剧。

欧洲人为什么想要坚持自己的愚昧无知呢？因为他坚持这样做，他就这样做。因为破除了愚昧无知，他就得抚心自问；而一抚心自问，就得承认他所承认不起的事情。譬如说，关于他对待土地本身及其居民的事情；关于勒令同意的那种盛气凌人的事情；口口声声谈合伙而坚持要独揽大权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吉库犹人写的书之所以重要的原因。这是第一部用非洲人的语言来描述尼亚萨危机的背景的书——尽管“茅茅”的事情在表面上已经告一段落，但是这个危机并没有解决。我希望这本书能广为流传，并能引人深思。即使有什么地方可以引起异议或者怀疑，我希望欧洲读者会这样自言自语地说：“这是非洲人的想法——对今天的非洲来说，只有非洲人的想法才最关重要。”

我尤其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激发基督教徒的天良，使他們能够进一步認識到基督教的失敗，同时也使他們进一步認識到基督教在今日非洲的命运。

特雷弗·赫德尔斯頓

1957年11月于梅尔費尔德

序 言

对有些人來說，怯尼亚大概只是指“茅茅”的土地罢了，没有什么別的意义；对另外一些人來說，那却是阳光普照的大地。“茅茅”那个組織采用的办法，已經使它受到了公开的譴責，但不幸的是，政治制度和种族統治政策本来是产生“茅茅”組織的两个主要原因，除了非洲人外，其他的人对这种制度和政策就沒有同样的痛恨了。

联合王国对我国人民福利負有直接的责任；尽管反对党黨員們和明瞭我国情况的公民已經确凿地証明对非洲人所犯的罪行全是事实，但是保守党政府还是寬容不究。最近尚在英王非洲来福鎗旅的鲁·希斯蒂給“每日电訊”写信道，“既然对‘茅茅’必須采取最強硬的行动是理所当然，那末，不对白人‘茅茅’也采取強硬的行动，便大可惋惜了；那些白人‘茅茅’对于所有非洲人都怀着一种莫明其妙的深恶痛絕的心情。正是这些人造成‘茅茅’……”他这样說，不但反映了这不是单独一个白人的情緒，也反映出几百万非洲人的情感；非洲人既被禁止搞政治組織和发行非洲报纸，实际上就被弄得哑口无言，这种措施无异于縱容白人肆无忌惮地去掠夺、迫害和屠杀非洲人。

有許多人对于我国的形势表示了道义上的关怀，然而挽救危局所依靠的人，不仅是表示了道德感情，而且还要認識到道德判断的实质乃是首先要挺身而出，其中有許多男

男女女以不懈的努力和勇气設法来喚醒全世界的基督徒和社会主义者的良心，使他們正視大人先生們或者东非、中非和南非的白人統治者的罪恶。無論所謂种族隔离，双金字塔政策，或者是白种人至高无上，这些罪恶对我们來說就是这么两件事：一方面是灭种政策，另一方面則是奴化教育。我們把希望寄托在那些相信人类的人格而予以尊重的人們。我們相信工党就是本着这种精神，在最近的政策声明中保証在殖民地废除对于黑人的差別待遇，必要时以法律来废除。这个直接責任不仅在非洲人的身上，也在联合王国选民的身上。

本书并不是一部自传。本书是战前和战后我在怯尼亚的經驗和回忆，也是成千上万佃民和他們的家属对于各种大事的一般看法。我自己的家庭可以說是中等以上的。至于那些中等以下的家庭，生活是非常黑暗的——黑暗得出于大多数外国人的想象。

莫加·吉卡魯

第一章

我回想起1928年来了，那年的大地震使东非洲許多地方都震动起来。那年发生了两件事情，至今记忆犹新。第一件：我就在那年遵照习俗，行了重生礼——重生礼的用意是，万一我不幸夭折，我还可以留下一个影子来，这个影子尽管是肉眼看不見的，会把我的灵魂带到来世；来世是个精灵的世界，无穷无尽的世界。我深信，死并不就是我的結束，也不是我和現世絕緣。第二件：在那一年，我得到了容許可以同牧童們一道上平原去，不必跟着媽媽和姐姐們呆在家里，也不必跟他們下地了。

在这以前，我象許多年幼的儿童一样，多多少少总算是个宠儿，父母把我嬌生慣养，照顧得无微不至。跟牧童們到外面去，那就全不一样了。不但沒有人来照应我，反而指望我去照应他們，凡是我体力能做的，無論为自己，为他們，什么都要干。除了吃飯以外，什么好处总是最后才輪到我。吉庫犹人有一句俗語說，宁可飢腸轆轆，餓得要死，也別詛飢餓的女人和未行成年礼的孩子把我罵得要死。根据这句俗話，男人总是詛妇女孩子們吃饱了才吃。

我們的家乡在怯尼亚的峡谷省，那是全国最富饒的地区之一。我父亲在地里干活；那块田地是一个移民所有的，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軍人，我們叫他“基霍罗”少校。我父亲是捉野兽的，他的工作，白天是捉豹子和狒狒，夜里是

不許野水牛、箭豬、疣豬、還有別的動物闖到種着玉米和馬鈴薯的園子里去。

这里离目前的“吉庫犹族保留地”中心区有一百五十多哩，你也許要問問，我們一家人怎样脫离我們部族，搬到这样遙远的地方做农奴的；黑皮肤的农奴根本没有拥有土地的資格。这件事說来話长。

早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我的外祖父在尼安达尔瓦山的西面盖起一所草屋，那条山脉白人称做阿貝达尔山，主要是梅賽族的地区。在山脉东面就是“吉庫犹族居留地”，除了外祖父外，我們一家人都住在那里。东西两麓通着羊腸小径和商旅通道，其中有許多条是从山脉两麓有人居住以来就存在的。那些大道从南方靠內罗毕城附近起，向怯尼亚山西部延綿，一直通到卡魯拉、卡里阿拉、木戈里、加奇、尼耶里和吉尼奥納。最后一条通往我家所淵源的那个地方，如同別的許多通道一样，經過很多历史名胜——那是一些与著名战役和成年礼庆祝会有有关的河川、山丘和峡谷。此外，也經過几处市場，尼安达尔瓦山东麓的吉庫犹族和西麓的梅賽族就是在那里进行物物交易的。每条通道上至少各有两处歇站，真正的商旅可以在此升起篝火，睡一夜好觉，用不着担心有敌人来进攻。尼安达尔瓦山东西麓的武士按照不成文的法律都承認那些歇站就是圣地，誰在两族武士和巫医所祝福的地方鬧出血案，那就是犯了瀆圣罪。因此，从四面八方远道而来的旅客，那怕冤家相逢，也都围在同一个篝火堆旁平平安安地渡過夜晚，大家知道貨物不会出什么岔子。我外祖父由于担任两族中的居間人，能够在梅賽族这边盖起一座大草屋，他的一半家私就藏在这里，还有一半存在山脉东面。我們一家人大部分都住在那里。

他蓋草屋的那塊地，雖然是在尼安達爾瓦山西麓梅賽族這一边，按照习俗归他自己所有，因为梅賽族公認他是自己人。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这里大部分的土地有的賣掉了，有的被白人移民根据英王給予的租借權拿了過去。我外祖父跟拥有山这边全部土地的梅賽人一樣，哪里知道白人对土地的看法和他們完全兩樣。当梅賽人被迫离开他們祖祖輩輩所占有的那塊土地，离开明眼人所覬覦的那片土地，受尽屈辱，被赶到奈瓦沙湖对岸又貧瘠又干燥的地区時，他們才恍然大悟。有些人甚至被赶到越过北部山嶺的那边，走进更干燥更貧瘠的地方。我外祖父沒有跟着梅賽人迁移，他回到了尼安達爾瓦山东麓，大部分吉庫猶族都居住在那里。

我父亲这一家田連阡陌，大部分都是祖上几輩在十七、十八世紀時从尼安達爾瓦山坡的恩德魯布族和阿吉族手里得来的。恩德魯布人是一个矮种民族，現在差不多要絕种了，如今殘存下来的都是祖先跟生殖力較強的吉庫猶和阿坎巴等农耕部族通婚生育的子孙。大約在十九世紀初年，他們好象是安居乐业的，在传教士和移民先后到来以前，沒有发生过什么难忘的大事。我祖父有五个儿子，我父亲排行第三。除了长子以外，几个儿子都在小学校跟美国内地会教士唸过书，那个学校是吉庫猶人在美国传教士的帮助和指导下建立起来的。我父亲念完两年以后，就在这个学校教书。大儿子到峽谷省替移民工作；有两个儿子守在家里，还有一个儿子參了軍；他和許多别的非洲人一道在坦噶尼喀跟德国人打过仗，非洲軍人在那里伤亡的人数超过英国人好几倍。

在战争期間和战争刚刚結束以后，政府在这些移民們

的压力下，通过了一系列的条例，为移民供应廉价的劳动力。这些条例终于成为“臭名昭彰的1919年劳动法案”^①。

这些劳动法案旨在削減非洲人的土地单位，使得许许多多非洲人无法维持生活，从而造成大批廉价劳动力。明显得很，如果非洲人拥有足够的土地，他们就可以种庄稼来卖钱，还可以从事畜牧，这就是说，他们不必为发给奴隶那点点的工资而干活了。移民们也注意到：如果非洲人在保留地还保留着一点点土地，可以种植值钱的作物，别的非洲人也会要求土地，而在劳动者当中引起“不满情绪”。因此，通过了一条法律，规定非洲人在怯尼亚若干地区种咖啡、西沙尔麻和除虫菊是违法的；禁种除虫菊是后来规定的，这是一种野生植物，它的花可以制造滴滴涕。

1951年在吉庫犹族地区有一个吉庫犹人种了一棵咖啡树。有人查问他，他便把这事件当做一个案子提出法律解决，来试探试探，法庭不得已判他无罪。现在，在这件事发生后，当局允许有些吉庫犹人种少量的咖啡树，但是数目有限制的，以便使吉庫犹人不能在市場上跟白人农民的咖啡大事竞争。现在种西沙尔麻仍然受限制。在开始的时候，議論紛紛，认为非洲人照料不了咖啡树，但是非洲人在坦噶尼喀和烏干达种出的咖啡品质优良，在国际市場上始終沒有被怯尼亚移民种植的咖啡所挤垮，而这件事却从来没有入提起过。

他们既然夺去了非洲人的大部分土地，也就是夺去了非洲人的生計，就需要进一步把他们赶出居留地去。賦稅增加了很多，一个人至少要在高地呆上一整年，方能勉強強

^① 劳动通令——1919年 第 873 号命令。

強有点錢来繳納稅款；要為他自己，為他住在居留地的家人添置衣服，那就談不上了。誰繳不出稅，誰就得坐牢，或者被打发到田地去從事奴隸勞動。

行政官吏必須執行這些法律。1919年的通令明明白白指示各區專員在權力內採取一切措施，務使當地人包括婦女兒童在內都替白人工作，同時號召酋長們出來贊助。各區專員還得進一步編制酋長名冊，填明在他們中間哪些人對強迫勞動制是贊助的，哪些人是冷淡的，哪些人是反對的。這個名冊遞呈總督，由他採取必要措施。

為了貫徹這個制度，所有的非洲人都被登上記了，隨身攜帶證件，關於這一點我在後面還要談到它。

如果這些措施還不能滿足移民們所需要的勞動力，那麼“臭名昭彰的勞動法”就可以採用其他特殊措施來進行威脅。麥克格列戈·羅斯^①、諾曼·萊斯博士^②等公務人員都曾發表過言論，撰述過文章，大力為非洲人民辯護，結果，他們象許多追隨他們的人一樣，卻被迫離開殖民地了。他們雖然離開了，可是依然存在我們的記憶里。

為了在怯尼亞給私人征集勞動力，政府毫不猶豫地採取了特殊措施。所有的非洲人，不論政見如何，都認為象這樣征集勞動力並為私人移民的利益使用強迫勞動的作法，就是政府在戰後所犯的最大罪行。

教書不是好差使，我父親辭職不干，跟他弟兄到峽谷省做牧人去了。從此，他便一直在那邊。

大約也在這個時期，住在怯尼亞中部基安布地區和沿山麓一帶別的吉庫猶人也遭到政府和移民的嚴重打擊。他

① 麥克格列戈·羅斯：“怯尼亞內幕”（MacGregor Ross: Kenya From Within）。

② 諾·萊斯：“怯尼亞”（N. Leys: Kenya）。

們的土地，用官方的話來說，是被合併了，而照我們非洲人說來，是被人劫奪了。

他們親眼看見公務人員來量他們的土地，但是莫明其妙。事實上，他們對於政府，對於白人，全不大介意。甚至也沒費心要去告訴白人遷居。他們所知道的便是“非洲土地保有法”，部族當局永遠可以根據這項法律，叫外鄉人從他人的土地上遷走。但是，這些外鄉人都是白人，他們都是統治者，誰也不能叫他們遷走。關於這一點，等到非洲人認識時，已經太晚了。

他們看見白人來了，拿食品來給白人吃，給他的仆役吃，也不要什麼報酬。他們還認為他是聽非洲法律管理的。其實並不如此！沒有多久，他們才恍然大悟，原來在尼耶里、南迪、峽谷、福特霍爾、基安布和全國別的部分他們擁有的土地上，他們忽然變成寄在白種異鄉人的簷下的“佃戶”了。“大地上”沒有一寸之土屬於他們所有；只要他們是非洲人，只要孩子們是他們孳生出來的子孫，就不能在高地上得到土地。

“我們的同胞只能坐在那里，眼巴巴地望着膏腴的大地，這是祖墳所在之地，他們却要為白人的利益來耕種，子子孫孫也要如此，即使為着退休，誰打算種這片土地，或者要上一畝地，也是犯罪行為。這真是一片膏腴之地，真是一片好地，好到沒有一個非洲人夠資格要它……這是一片空地，但是專為白人保留的……非洲大陸的嗷嗷待哺問題卻沒人過問。”一位非洲政治家在讀1934年卡特土地委員會報告時這樣說。

我們的土地，我們的命根子，這樣被人奪去了，這無異是把一塊石頭壓在我們的心頭上，只有象我們這種鄉下人

才能完全体会到它的沉重。

1913年和1919年的劳工通令播下了第一批无限怨恨的种子。

不論在当时，还是在目前，就解决移民需要廉价的劳动力来说，这些措施正象在南非联邦一样，获得了无限的成功。那些丧失了土地的人们都到高地工作去了。还有一些人，象我外祖父那样，到了移民区，他们心想工资虽低，只要靠经常的劳动，他们就能把那两亩因每年服役而种植的土地买回来。

他们自己老老实实，易于轻信，当初白人劳工掮客通过那些政府随手挑选并付给薪水的酋长跟他们来谈，他们哪里会怀疑掮客是否诚实可靠，但到后来为时已晚了。

对于不大了解怯尼亚情况的人，“酋长”这个词需要加一点解释。举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酋长是怎样处在附庸的地位，我还记得在“茅茅”案爆发以后，有一个英国议员团来到怯尼亚，据说他们的使命是调查真相。他们走过许多地方，会见过老老少少许多非洲人，并且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倾听他们对土地、工资、住房、肤色界限等问题的诉苦。随后他又来到某“酋长”的府邸，想征求他的看法。他们在花园里看见他，打过招呼以后，他们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使命。酋长对他们说，“这件事我一点不知道，那是卜瓦纳的事情”，他指的是区专员。因此他回绝了，直到区专员批准了，他才和他们谈。区专员对于非洲人的丰衣足食，心满意足，以及煽动者的恶劣行为作了详尽的说明，他每次掉过头要酋长来证实时，酋长连连称“是”，结果议员们说他口里所听到的只是如此而已。

严格地说，酋长们都是徒有虚名的。他们都是些“无名